



# 天堂之火

Mary Renault

[英] 玛丽·瑞瑙特——著  
郑远涛——译

FIRE  
FROM  
HEAVEN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 天堂之火



Mary Renault

[英] 玛丽·瑞瑙特——著  
郑远涛——译

FIRE  
FROM  
HEAVEN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 天堂之火

[英] 玛丽·瑞瑙特 著

郑远涛 译

出品人：王 蕾

总编辑：姚映然

责任编辑：陈欢欢

营销编辑：张天宁

封面设计：高 熹

封面插画：Geoff Grandfield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3.125 字数：295,000 插页：2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ISBN：978-7-208-12863-7/I·135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之火 / (英) 瑞瑙特 (Renault, M.) 著; 郑远涛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Fire from heav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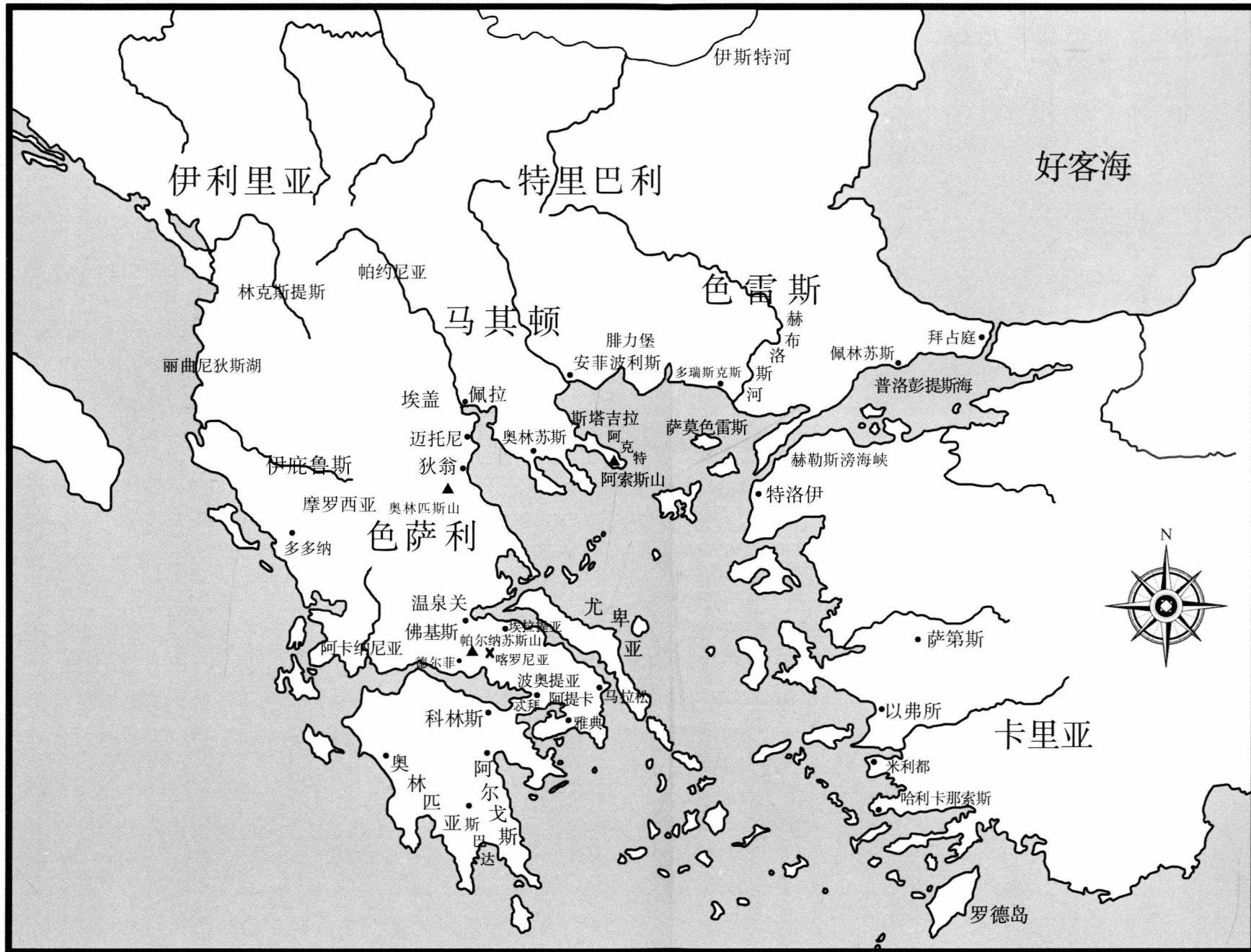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12863-7

I. ①天… II. ①瑞…②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0511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地图由台湾基本书坊授权使用  
绘者: Linda Chen

## 二十世纪的古希腊之魂

### ——玛丽·瑞瑙特的创作人生（代译序）

郑远涛

“他的脸多年来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双不可思议的眼睛，那头发在额上跃跃弹跳，还有那想必在他二十来岁已沧桑毕露的美，晒伤的皮肤黝黑，太阳下的头发近乎白色。”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 1905—1983）在1960年代末写给一个牛津大学同窗的信件中这样谈起亚历山大大帝，仿佛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确是故人。玛丽始终记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念书，参观了校内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被内中几件著名文物的复制品深深打动：腰身细巧的克里特岛斗牛者、金发的城邦青年（Blond Ephebe），还有雅典卫城出土的亚历山大头像。带着这些不可磨灭的记忆，玛丽经历了毕业、几年的独自漂泊、护士生涯、首次出书和“二战”的炮火。后来她和伴侣朱莉·穆拉德离开寒冷保守的英国，到阳光灿烂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没有回去。在南非海滨，玛丽的希腊灵感才终于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终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据扎实、想象驰骋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洋洋千页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

1905年查伦斯医生夫妇生下长女玛丽时，料想不到她会成为不凡的作家；他们也不赞成女性拿写书当职业。查伦斯娶了牙医的女儿，婚姻门当户对，属中产阶级，家中有仆役多名，但夫妇俩个性扞格，

常争吵不休。玛丽早早显露逾矩的性格，既活泼奔放又嗜书如命，尤其喜欢牛仔故事并在游戏中搬演，离母亲期许的淑女相去天壤。成为作家的瑞瑙特，回忆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说“不记得有哪个时期是我不盼着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离的孩子，这些心灵创痕将来会成为她作品里反复演绎的主题。

中学寄宿时，玛丽在校图书馆发现柏拉图的英译本，毕业前读完了全部《对话录》。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动荡世界在她脑海中潜伏浸润数十年，方酿出杰作《残酒》（*The Last of the Wine*）和《阿波罗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因成绩优异，她进入当时专收女生的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主修英语。

“牛津造就了我。”后来瑞瑙特喜欢说。然而当时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学也不免给她带来挥之不去的边缘感。无论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响她一生的两位老师：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后来以《魔戒》的中洲成为一代文豪的语言学教授托尔金（J. R. R. Tolkien）。托尔金在学生们面前朗诵史诗《贝奥武甫》，使瑞瑙特感到这部陌异的古英语诗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讲课则使她重燃对柏拉图的热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对希腊文所谓 arete（个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异，天赋参差，但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

毕业后玛丽不顾父母反对，过了几年边打工边笔耕的生活，终因营养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养。1933年夏，一筹莫展的她做了个改变终生的决定。徒步旅行重访牛津时，她在毗邻母校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门外歇息，省悟到她写作的挫败是由于缺乏人生体验，而在这所古老的医院中，生老病死永恒地上演着。她当即谒见院长，说服让她留下学习护理。这年她28岁。

工作繁重、戒律森严的护士学员生涯，对一个牛津毕业的姑娘是

屈就，但是玛丽坚持了下来。日后读者会在她描写男孩亚历山大的《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中看到斯巴达式锻炼，领会早年的纪律约束无论是对挥剑的亚历山大还是挥笔的玛丽，都同样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玛丽邂逅见习护士朱莉·穆拉德，两人情投意合，后来相伴终生。

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访谈，说她和玛丽都是双性恋，各自跟男性发生过恋情，但最终选择了彼此。瑞璘特自己讲过：“我想许多人的性欲望是居间的……就像从白到黑的色差，中间是各种各样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为第一主角，转型写历史小说后，叙述者“我”总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导致读者常认定“玛丽”是男作家的化名。《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的叙述者是一个性别暧昧的阉人。伍尔夫(Virginia Woolf)提出“伟大的心智雌雄同体”，瑞璘特则说：“我从来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内在自我都不加区分地占据着两种性别，以至于不可能参与性别之战。”她自由化入各种性别身份的能力，足证此言不虚。

完成学业后，玛丽从事护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写小说。她用笔名“瑞璘特”登上文坛，头两部小说出版于战云密布的伦敦。“二战”爆发，玛丽和朱莉响应政府动员令，先后在地医院照料伤兵，并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务。医院中做勤杂工的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与士兵之间的冲突和友谊给玛丽带来震动，战争尘埃落定后被她写入《御者》(*The Charioteer*, 1953)。

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注创作。迄移居南非为止，瑞璘特共写成五部小说，都是当代题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致力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不乏骇俗的性意识。《相好的姑娘们》(*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 1944)是半自传性的轻喜剧，书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归向夜晚》(*Return to Night*, 1947)赢得米高梅奖



金。1948年，这笔钱让玛丽和朱莉踏上远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璘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这个新国度，她和朱莉举办派对，结识了大群的年轻演员和舞蹈家，不少是来自英国的退伍军人，多数是男同性恋者，他们的聚散离合激起玛丽的灵感，写出现代同性恋文学史上的名作——“二战”爱情故事《御者》。书名采自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个意象，喻示灵魂中骚动和驾驭的矛盾。这部以古典烛照现实的作品成了瑞璘特创作的分水岭；其后，她沿着历史长河继续回溯，在音声已希的古希腊世界上岸。

第一人称回忆录体的《残酒》（1956）以希腊文明悲剧性的漫长内耗——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 B.C.）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亚的成长故事。他与吕西斯的关系再现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恋习俗：较年长的“爱者”（*erastes*）要担当他倾慕的少年“所爱”（*eromenos*）的精神导师。瑞璘特自言是《御者》导向《残酒》。前一本书中，现代同性恋者面临医学、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转入地下生活，难以获得灵肉兼备的满足，而《残酒》的两位男主角则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共同追求光荣的时代：在苏格拉底身边受教，在练身馆竞技，一起参加地峡运动会，为抵抗斯巴达并肩作战。在性议题上，瑞璘特说她反对“性的部落主义”（*sexual tribalism*），觉得现代人纠结的性身份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希腊人问的是一个人有何优点，而希腊人是对的。”

《残酒》不仅是个爱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画卷：书中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寡头与暴民轮番上台。在玛丽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赢得大选，随即颁行种族隔离的政策。瑞璘特目睹政党利用非理性的民众情绪而控制国家，进一步激化了原已复杂的种族矛盾。尽管她奉历史现实主义（*historical realism*）为圭臬，从不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



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写三十僭主操纵雅典社会时，常联想到她的此时此地。“历史并不重复它自己，其韵脚却每每相同。”这句归于马克·吐温名下的话看来有点道理。

《残酒》受到严肃书评人和读者的一致赞赏，奠定了瑞瑙特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成功并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学者出身，拉丁文颇有功底，希腊文却全凭自学，常读的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洛布（Loeb）古典丛书。然而她一丝不苟，研究两年方才动笔，初稿写好后远赴希腊实地旅行，以求细节无误，最终做到“对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真正神入（empathy），这是把想象力，把一种深沉的人道精神，极致地应用到史料知识上，以至它化为本能的结果。”<sup>[1]</sup>

希腊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岛，观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复的希腊史前文明遗迹——克诺索斯王宫，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开她眼界的文物，这次是真品。

据说，这里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闯迷宫，杀死牛头怪的地点。身临其境，她悸动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据历史学者的理论和考古学的成果，剥除忒修斯传奇中的荒诞之辞，写成两部小说。那神话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于心理深度的诠释。《国王必须死去》（*The King Must Die*, 1958）和《海里来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 1962）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称的“自述”，早在希腊古典时期已沦为童话的忒修斯，形象从未这样血肉丰满。相传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认为那是后起的附会，而把他写成一个仿若出土的斗牛者壁画中那种细巧灵活的人——祭献给牛头怪弥诺陶弥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

---

[1] 见 David Sweetman 著 *Mary Renault: A Biography*, 第 262 页。引文本来是瑞瑙特对爱尔兰历史小说家欧布莱恩（Patrick O'Brian）的评语，转用回她自己身上也恰当不过。

在小说中是斗牛者。无独有偶，史载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也不高。亚历山大刚柔相济、泛性恋（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爱恋女子却排斥自身“阿尼玛”（anima）的倾向，恰成对比。<sup>[1]</sup>

在南非开普敦，玛丽和朱莉在一栋木屋住了多年，她们命名为“提洛”（Delos），原是爱琴海岛屿，传说中阿波罗的诞生地。“提洛”俯临大海，远眺平顶的桌山（Table Mountain），雄奇壮美。带盐味的轻风、滑翔的海鸥、远远的航船和勇敢的冲浪少年，都跟她笔下的另一个海洋文化——古希腊一样充满生机，不啻是她理想的写作环境。但外面的世界毫不自由，甚至这对伴侣日常散步的海滩，也竖起过“只许白人入内”的牌子（被玛丽用螺丝刀趁夜摘除）。1960年代，瑞瑙特一度卷入政治生活：上街游行反对种族隔离，参加抗议团体，到社区为政党拉票。然而政治讲求集体行动，处处需要妥协，与作家对“个人卓越”的信念相违。因此，她虽然在劝说下出任了国际笔会（P.E.N.）开普敦分会的会长，并跟图书审查长年斗争，但年事的增长、对政治的失望，令她逐渐淡出运动，重投想象世界。

《阿波罗面具》（1966）以一个周游列邦的演员为叙述者，以剧场黄金时代的一件遗物——阿波罗面具——为良知的象征，展现了柏拉图实践治国理念的故事。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强人僭主用密探施

---

[1] Anima 是拉丁文的“灵魂”，在荣格心理学中指男性心灵中的无意识女性人格。瑞瑙特钦佩荣格关于个性发展的学说，曾说《国王必须死去》是“百分百的荣格式小说”。荣格不像弗洛伊德那样认为单是无意识的性驱力就决定了人的行为，相反，人的选择、目标和希冀同样关键。瑞瑙特在刻画主角童年以提供日后发展的心理动机时，多次借鉴过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但她强调自我塑造，主角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使她对人性的看法跟弗洛伊德拉开距离，而更接近于荣格。参见 Sweetman, 第 205-206 页。

行恐怖统治，死后国家陷于混乱，跟瑞璘特身处的非洲现实若有交集。但作者强调她写的不是影射小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话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永远奔流的人性之河，由于所经过的土地而不断改变，成为浅水、漩涡、瀑布和湖泊。或许历史唯一具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考量这种本质和个案之间的永恒变化的互动。”

瑞璘特对柏拉图终身保有仰止之情。“在他身上，亚历山大炽热的想象力会找到一个解人、一个向导。”柏拉图两度远赴叙拉古，辅佐不成器的二世僭主做“哲学家国王”而惨淡终局，令人扼腕。他死时，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年约八九岁。假设柏拉图来得及教导亚历山大——假设是他而非亚里士多德做了亚历山大的教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借着《阿波罗面具》叙述者的口吻，作者抒发了自己的怅恨：“一台悲剧……其悲哀在于主角们从未相遇”。

亚历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1970）、《波斯少年》（1972）、《葬礼竞技会》（*Funeral Games*, 1981），加上一部传记《亚历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 1975），花费了瑞璘特最后十几年的大部分时光。历史上，亚历山大是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巨人，在城邦制走到绝路之时横空出世。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马其顿崛起前，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长年争斗，令希腊文明危机四伏，而亚历山大的政策“给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带来四海一家的观念；以往对城邦的忠诚与（在较小程度上）对希腊民族的忠诚看来已不合时宜了。在哲学上，这种世界主义观点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实践上它开始得较早——始自亚历山大”。瑞璘特对希腊文明的回顾，从《残酒》到《阿波罗面具》再到亚历山大系列小说，写作次序和历史发展恰好一致，各书脉络也相互贯通。1960年代以来西方反战的呼声很是强烈，到瑞璘特写亚历山大时，她很清楚这位征服者是个逆潮流的题材。然而令她最



着迷的大概并非亚历山大的军事才华，而是他无畏无惧、闯荡四方的自由——她自己不是从记事起就渴望“走出去”吗？《天堂之火》中，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情节塑造他那无畏的心性。少年亚历山大首次厮杀前感到胆怯，在晨曦中向赫拉克勒斯申诉，听见神告诉他：“人的不死并非在于永远地活着，那愿望源自恐惧。令人不死的是每一个超脱于恐惧的瞬间。”

历史学家霍兰（Tom Holland）指出瑞瑙特亚历山大小说的特色在于她对亚历山大能切身认同（self-identification），这在《天堂之火》中尤其显著。亚历山大跟作者一样，父母的关系剑拔弩张。这种家庭张力是以象征手法烘托的。欧里庇得斯晚年作于马其顿的《酒神女众》（*The Bacchae*）把人性中文明理智和本能迷狂的两极冲突予以戏剧化，它在小说中有一台演出。这部戏象征着崇拜酒神的奥林匹娅斯对儿子亚历山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他相信自己是“神之子”。另外故事开始时，缠绕五龄童亚历山大腰间的蛇，是母亲捆绑他的、他后来努力挣脱的纽带。小说结束时鹰蛇厮斗，则是借自《伊利亚特》（第十二卷）的意象，小说中蛇代表母亲，鹰（宙斯的神鸟）代表男性因素。<sup>[1]</sup> 荷马的诗里，大蛇咬伤鹰的胸脯，使之松开脚爪翔离，《天堂之火》的鹰蛇搏击却胜负未定，暗示父母双方的烙印在亚历山大余生中将继续起伏消长，造成他一些悲剧性的过错。

然而《天堂之火》不是悲观的，故事明暗交错，亚历山大始终是希望之光。他是荷马史诗在精神上的最后一个传人，以阿基琉斯为榜样，宁舍长寿而追求光荣，要用战斗来证明自己犹胜乃父。他师从大哲亚里士多德学习治国、伦理和科学，但比亚里士多德更富于想象力

---

[1] 参见 Bernard F. Dick 著 *The Hellenism of Mary Renault*，第 102-103 页、第 110-111 页。

和热情，又能在实践中超越老师的种族偏见。他情感细腻，却由于父亲性放纵的反激作用，秉持着近乎禁欲的节制。家庭张力使他从小向外寻求友谊：从卫队的营房、马厩的仆役、波斯流亡者那里增长见识，得到安慰；受《伊利亚特》英雄情谊的熏陶，他与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随的伴侣。正如朱莉陪伴着玛丽度过不少艰难岁月，友情是亚历山大一生的救赎。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频频使用 *pothos*（希腊文“渴求”、“热望”）一词，解释亚历山大为什么永远向前，决心走到世界的尽头。《波斯少年》借叙述者巴勾鄂斯之口，多次点明亚历山大这种不知疲倦的探险家性情。作者又让亚历山大告诉巴勾鄂斯：“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刻，回想起来就是快乐。”我们可拿这书当旅行记来读，追随亚历山大从里海之滨走到今日阿富汗，到印度旁遮普，到沙漠，到伊朗，写实之中又有一种异域奇幻的色彩，令人想起托尔金是瑞璘特的老师。

《波斯少年》从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视角看待亚历山大远征，这是文学的创举。作者曾说，马其顿人对波斯人充满偏见，是她不想用的视角；同时她希望在书中容纳波斯人对马其顿人怀有的一些偏见，展现亚历山大如何克服它们。叙述者巴勾鄂斯的身份极不寻常，他是被波斯末代君主和亚历山大先后宠幸的宦官。由一个异族的阴柔者说出最勇武的战士的正传，颠覆了两千年来的主流叙述方式，也开阔了读者的眼界。用内廷宦官的观点叙事，代价是亚历山大一生的几场大战都只能用远景镜头或转述来呈现（作者出于和平主义立场，也许本就有意简写战争，而且屡借巴勾鄂斯的眼睛凸显战争的惨象），优势则在于让护士出身、对肉体富有第一手知识的作者，能够无微不至地描写健康和伤病时的身体，因为巴勾鄂斯在亚历山大生命中扮演

的常常就是护士角色。当他怜惜地端详亚历山大布满伤疤的肉体，或在战场外遥遥注视国王受伤的过程时，瑞瑙特笔力千钧。巴勾鄂斯和亚历山大的爱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国王的奉献式的爱，令人想起和瑞瑙特年龄相仿的奥登（W. H. Auden）的诗句：“If equal affection cannot be, / Let the more loving one be me.”（若爱情无法平等，/ 让我做那更深爱的人。）它不同于赫菲斯提昂和亚历山大荷马式的同袍之爱，也不同于《残酒》的雅典男风。但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后短短数月便采取东方化的政策，巴勾鄂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亚历山大的话是：“从爱你开始，我学会了爱你的民族。”瑞瑙特写下这些文字之际，南非正因其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国际社会孤立。作者褒扬亚历山大超前的同时，也对某些现代人倒行逆施作了含蓄的批评。

如果说亚历山大军事才能近乎超凡，他的治国手腕则显出人性的弱点。在《波斯少年》里，他立志建立一个种族平等、选贤举能的帝国，但任用官吏偶尔也所托非人，而马其顿将士们以胜利者自居的骄矜，更多次阻碍他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瑞瑙特暗示他悲剧性的一面既有个人因素，又是其思想超出时代的必然结果。到了三部曲的终篇《葬礼竞技会》，亚历山大便以缺席来显现他的伟大：各怀私利的将军和王族女眷全都缺乏他全面的天才，挽不住帝国分裂的狂澜，也大多难逃血腥的下场。

《葬礼竞技会》类似编年史的结构，似乎打破了作者自《御者》以来始终运用的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模式。比如《波斯少年》就既是亚历山大正传，也是巴勾鄂斯个人的成长史，写出他如何从童年的劫难中解脱出来，长成一个觉醒的、善用生命的强健人物。然而《葬礼竞技会》的一种读法，是把它看成欧律狄刻的成长故事。她是瑞瑙特历史小说中绝无仅有的女主角，生为天潢贵胄，自幼习武，她唯一的 moira（希腊文“天命”、“命运”）是像亚历山大一般



以武功和权力实现自我；却野心有余，愿景不足，有一时之勇而无亚历山大在严酷的成长教育中炼成的魄力；女性身份也孤立了她，最终从权力高峰坠落。瑞璘特不回避欧律狄刻的幼稚和自私，但也予以同情。或许她意识到，以她童年要做牛仔的志愿、以她少女时期壮怀激烈的白日梦，倘若生于古代，她本来也可以是欧律狄刻。就事论事，欧律狄刻在历史舞台上的七年只能说是夭折的成长史。《葬礼竞技场》是一支挽歌，角色的明暗呼应像是以对位法（counterpoint）谱成的旋律：亚历山大的贤妻斯塔苔拉对恶妻罗克萨妮；他视若母亲的、情深义重的波斯太后对他毒辣的生母奥林匹娅斯王后；欧律狄刻的怯弱对她傻丈夫的勇敢……使得这暗黑的故事也偶尔闪现人性的高贵。亚历山大的幽光如同一轮午夜太阳投射在战火纷飞的疆域上，连这太阳也快要沉落了。但是全书最后一句却描写亚历山大陵寝的屋顶上月桂叶的金环，它“在地中海的微风中轻轻颤动，栩栩如生”，喻示他生命虽短，他的 *pothos* 会活在人类的记忆里。

瑞璘特晚年写道：“我们走向过去，也许是为了寻回自己，也许是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挣脱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条把我们带到今天此处的崎岖长路之后，我们才可能理解自己。”古希腊文明构成了瑞璘特小说世界的底色；即使在她那些当代题材的故事中，人物也常被希腊神话和文学的光束所映照。不同于许多文人对古希腊怀有单纯而美好的向往，她的古希腊远非世外桃源，而是和她生活过的时代一样战乱频仍、社会激荡。无论她的主人公是开辟新天地的英雄如忒修斯、亚历山大，抑或流徙不定的士绅、演员、颂诗人，还是平凡的伤兵、医生、护士，几乎每一位都努力在挣脱环境的掣肘，塑造自我，寻求自由，如同他们的创作者从家庭，从英格兰破茧而出，寻求自由一样。希腊人的理想——光荣、自尊、卓越、适度；阿波罗的理性和狄奥尼索斯的沉醉——在玛丽·瑞璘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御者》里，体

验着成长之痛的主人公想起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那篇对话：“现在它不再代表饱满完整的东西了，而是充斥着困惑与不定与痛苦与悲悯，和一团乱麻的倏忽人生。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本书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而写的。”瑞瑙特崇敬地称苏格拉底为“我的主保圣人”；在他看来，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捧读瑞瑙特的日日月月，对于我就是一趟得以审视生活的旅程。

## 主要角色

(英文字母序)

阿癸斯 Agis 腓力王的卫士

埃斯基涅斯 Aischenes 出使马其顿的雅典政客，曾是演员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本书主人公

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德罗斯 Alexandros of Epiros 伊庇鲁斯国王，奥林匹娅斯之弟

阿敏塔斯 Amyntas 腓力之兄佩尔狄卡斯之子

阿敏托尔 Amyntor 赫菲斯提昂之父

安提帕特罗斯 Antipatros 腓力的将军，马其顿摄政

阿奇劳斯 Archelaos 马其顿先王，培拉宫殿的营建者

阿里斯托德莫斯 Aristodemos 雅典使节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的导师

阿里达乌斯 Arridaios 腓力之子，白痴

阿塔罗斯 Attalos 马其顿将军，喀罗尼亚战役中任帕曼尼恩的副手

大流士 Darius 波斯帝国的国王

德马拉托斯 Demaratos 科林斯贵族，科林斯议会期间招待腓力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雅典辩论家

德基罗斯 Derkylos 亚历山大的体育教师

小狄奥尼索斯 Dionysios the Younger 叙拉古从前的城主